

不平等的弊端：权力、文化与机会

古德曼

不平等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国在这方面也不例外；尽管在 1979 年之前的三十年当中，国家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强调平等。崔永元是中国电视名人（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的《小崔说事》）、全国政协委员和社会评论家。他在 2011 年年底对中国的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的评论在社交网络和博客上经常被引用：

“我记得，小时候书本上说中国用世界 7%的耕地养活了 22%的人口。可是它不告诉我们，这 22%人口养了世界 60%的公务员；这 22%人口的教育经费只占世界的 3%；这 22%人口的财富的 97%集中在 1%的人手里；这 22%的人口中的 90%吃着全世界最毒的食物，缴纳最高的税，干最脏最累的活。”（2012 年博客）

这种从根本上反对不平等的立场，由重庆原领导人薄熙来于 2012 年 3 月全国人大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以有些反常的方式（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他迫在眉睫、但当时尚未知晓的“灭亡”）——如果说是更加具有中国特色的话——体现出来。除了其他关于不平等的评论之外，薄熙来明确地强调了近 30 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反映收入平等状况的指数）随着经济增长而上升，并指出当系数到达 0.4（0 是完全平等；1 是完全不平等）时，通常会预期出现社会不稳定。按照薄熙来的说法，中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之前是 0.2，但现在已经上升到 0.5。（薄熙来 2012 年。）

批判不平等现象的当代言论在道德方面的优越性是很明显的，但出自两个重要的原因而可能值得进一步考虑。第一个原因是最明显的：也就是说，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几乎不需要进一步加以评论，那就是人们对于平等的渴望。然而，这一点也可能受到质疑，至少应该基于现实和理论的原因而予以考虑。例如，正如人们常常声称的那样，假如平等会使创新失去激励，那么它可能并非那么符合人们的愿望。第二个原因则是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说，怎样将不平等现象概念化，尤其是不要局限于对基尼系数的讨论，甚至不要局限于对财富的讨论。不平等的弊端主要不是因为它的存在，而是在于它被概念化、并且随之从社会学和政治等方面对其进行管理的方式。

不平等、发展与国家

就不平等和平等而言，两者都是复杂的概念，不容易予以分析。例如，这两个概念可能从许多方面涉及到物质利益的分配、获得公共物品或公共医疗和私营医疗的机会等等，所有这些并非都可以采用同一尺度予以衡量并互相比较。此外，关于不平等的弊端，这个观念在历史上是有些不可思议的，更遑论“平等更为可取”的观念了。大多数的前工业化社会都是以高度的社会等级划分为基础的。只有到了 20 世纪，随着大众社会的来临，关于平等的言论才真正成为主流。（Kornhauser, 1962 年；Ortega y Gasset, 1994 年）

从根本上说，关于不平等的问题，自从 20 世纪中叶以来，在全世界的公众言论中有两个相互冲突的观点占主导地位。第一个观点反对不平等，强调对于物质财富以及获得公共资源（尤其包括政治资源）的机会的个人平均分配。有趣的是，这种平等观念很快地接受了性别差异，但在接受不同民族的文化以及不同肤色之间的差异却并非那么迅速。将不平等现象描绘为极坏的状况，这种观念是非常牢固的。公平（平等对待）的概念并不局限于儿童，虽然其精确定义可能有待探讨、争论。等级平均主义（Rank egalitarianism）迄今很少被实行，但作为一个原则，其影响力是很强大的。

关于不平等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平等至少是同样有缺陷的。这种观点常常将平等看成几乎等同于“等级平均主义”。有人认为平等会破坏主动性并导致激励作用的丧失，因为努力工作得不到奖赏，更谈不上风险的回报了。虽然较少有人认为不平等在道德上是优越的，但它却被认为在伦理上是有充足理由的：根据工作的质量——而不是仅仅根据投入的数量来确定工作的回报。这种观点承认差异，鼓励提高效率。从本质上而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政治挂帅的毛泽东时代（1956 年至 1976 年）确实带来了平等，但那是贫穷的平等。在改革的时代，国家有责任鼓励个人提高效率。（Harvey, 2007 年）

这两种立场当然是极端的，不过确实突出地表明了一种现实的二难困境。过分强调平等，将其视为对权利自动进行再分配，则会导致差异得不到回报，任何人高于最低基本水准的努力得不到鼓励。过分强调不平等，将其视为对于差异的回报，则非常可能会轻而易举地忽略造成差异的社会和个人原因，或者仅将其视为个人权利，而没有顾及社会后果。那些富裕而健康者的子女仅仅是简单地继承父母，无论他们本人的能力如何——也许更重要的是，无论那些在教育或背景方面处于弱势的其他人能力如何。上述明显的观点对立会造成紧张的局面。这就需要国家发挥其作用：既要保障基本权利，又要鼓励提高效率；在为社会和经济活动提供安全的框架的同时，确保基本的社会福利。

接受不平等，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不平等，这几乎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为了发展而采用的主要处方。不过，近年来的研究又重新强调保持平衡。一项广为人知的研究认为，比较平等的社会是比较健康的社会（Pickett 和 Wilkinson, 2011 年）。还有一些研究提出，尽管有一些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信心，但在比较平等的社会中，更有可能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在那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的国家。（UNRISD 2010 年）

平等、收入与财富

不幸的是，决策者甚至学者常常采用的一些误导的观点，阻碍了对于不平等及其后果的研究。不平等常常是被视为经济问题，而且即使如此，收入与财富两者也常常被混为一谈。有一种倾向是专注于当时环境，而不是历史背景；而且，同样不是在其空间环境下来看待不平等，从而将社会心理学的解释同统计分析混为一谈。

过分强调从经济方面来判断不平等，这是进一步进行考察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起点。这种过分强调的理由并不难确定：从经济方面来判断不平等，可以做到量化，因而多少会让人觉得比较客观，并且在制定政策时确实比较容易用公式来检验。这样当然是相当符合逻辑的。财富——甚至收入——都确实可以有效地作为不平等的标志。同时，经济上的不平等只能是事情的一个方面，甚至可能是附带的、偶然的現象。

将收入与财富等同起来、混淆起来，这是一种常见的观念；或许同样是因为便于测量的缘故。人们花了许多努力，从比较的角度讨论基尼系数，似乎基尼系数确实是对财富比较全面的衡量，而不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收入或消费指数。收入和基尼系数往往被认为代表了财富（世界银行，2012年）。这个观点同样并非完全带有误导性，但也并不全面。

有趣的是，经济不够发达的社会，可能也是比较不平等的社会，这一点至少从基尼系数可以看出来。与此相反，具有较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经济体（例如美国、英国、日本），基尼系数可能较低，这意味着在经济方面比较平等（Maddison, 2007年）。就中国的情况而言，2010年的基尼系数是0.47（Chen Jia, 2012年），当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4,400美元（世界银行，2011年）；这个数字跟那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其基尼系数所反映出来的不平等与之相似的其他经济体当中的数字并不是一回事。

这些关注，涉及到经济不平等可能产生的更为广泛的后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基尼系数如果达到0.4，就会威胁社会稳定。这个观点常常被公开提及（Fang, Yu, 2012年）。然而，统计数据并不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转化为社会或政治动力。除了客观上存在不平等之外，个人和团体必须对不平等感到不满，并打算针对不平等做某些事情，才会随之出现行动。事实上的不平等可能会被当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简单地被接受。在理解人们相互比较的环境时，了解人们的参照体系也是很重要的。一般而言，在不平等现象发生的当时和当地，对不平等的不满也最强烈（Davies, 1962年）。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而言，全国的统计掩盖了这个国家的规模以及在全区域和次级区域多样化的格局。最近的研究确定无疑地表明，挑战社会稳定的倾向，并不遵循通常对于统计数据的诠释。（Whyte, 2010年）

政治权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上的不平等常常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一个正在经历这样迅速的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非事物的全部。经济不平等显然并非不平等的唯一表现形式，更遑论其唯一或主要的决定因素。在政治权力、文化和机会等方面也有明显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之间、以及与经济上的不平等之间，有时是彼此重叠的、相互交叉的。

不少作者已经着重指出了由于行使国家权力而造成的不平等——该做而不做的罪过和该做而做的罪过（郭，2013年）。国家不平等地分配或管理资源的再分配。事实上，自从1949年以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平等从来都没有成为国家行动的一项原则，尽管不平等的类型有所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工人、农民的优越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工农兵的特权；到了20世纪90年代，则根据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承认在创造财富、政治领导和民族主义方面更加“先进”的分子的重要性。

对于政治权力造成的不平等进行制度研究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解释所引起的反应和抵抗更为重要。近几年来，针对政治不平等，出现了许多正式和半正式的政治抵抗行为，并引起了大众的极大关注。其中比较著名的，有2011年年底和2012年初的广东省乌坎村事件，当地政府夺取土地，引起村民抗议、示威，抗议活动的一名领导人在受到地方官员的压力之后自杀（Yin，2012年）。在2011年年底，对于下列情况反映出来的政治不平等的解释和改变现状的必要性却没有引起显著的公众关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有大约一百名独立候选人得不到批准，并且往往是在党组织的反对下参选的。在许多方面，这比乌坎事件以及类似的乡村抗议行动更加值得注意，尤其是因为得到支持的党外候选人几乎一定是善于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却没有多少实际作用的。

与此同时，政治权力不平等的表现，远远超出了国家权力的制度性行使以及被排斥者的反应。同样重要的是，与之相关的政治权力不平等的规模。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新富豪的行为，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出现的新企业家，他们推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考虑这些人的政治行为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他们内部的关系，或者与党和国家的密切关系。他们被视为各种类型的“红色资本家”、“权贵资本家”、国家资本家，相关的阐述强调的是他们的经济领导地位和政治关系。（Dickson 2003年；Dickson 2008年；黄，2008年；Tsai 2007年；赵 2010年）

研究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不是设法容纳他们的活动（这至今仍被认为在政治上是“不妥善”的），而是设法鼓励他们参与政治程序。这种鼓励不仅表现在现有的党员身份，而且表现在任职于党外的国家机关职位，比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Chen Minglu 2011年）这些新企业家有相当大的比例——也许多达三分之一——是从以往的国家社会主义时代的党和国家体系产生出来的，所以他们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政治程序有其生涯背景。

另一方面，有相当比例的新企业家是比较独立地开始他们的经济活动的，即使他们以后会在党和国家体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这种位置，正标志着承认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及其后果。即使并非全部，但有许多在党和国家体系之外开始他们的经济活动的新企业家，以前不愿意与中国共产党或政治程序中的其他部分发生紧密关系，对这种关系感到不安；现在也仍然是这样。然而，他们最终会意识到需要这样的政治关系，如果他们随着生意的发展，想要获得土地、劳动力和贷款的话。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经常听到企业家在非正式场合谈论自己宁可跟政治分开——即使他们已经开始参与政治。（古德曼 2008年）中产阶级和大学生常常表示出类似的态度，他们非常清楚政治权力的不平等以及自己跟中国共产党保持距离给他们的职业前途带来的后果。

文化

中国人用来形容另一个人的最不好听的话之一，就是“没有文化”。确实，当人们提高嗓门或发生冲突的时候，经常可以听到这个词语。“文化”在这种场合经常等同于“正规教育”，但是其含义更广。传统上，“文化”被定义为中文的读写能力，因而等同于正规教育，即通过学习中文经典著作来学习阅读和写作；在一定程度上现在仍然是这样。其次，文化是一个人的行为和言谈，以及学问和知识。

对于文化的这种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在中国的社会随处可见的不平等，是众所周知的。从农村来到城市地区寻找工作的外地民工对于他们因为文化程度低而被视为低人一等感到不满。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所以必须搬到城市，靠出卖劳动力谋生。他们反对那些利用他们的劳力、但结果却不公平地对待他们的企业家。他们感到被政府遗弃，因为政府不再维护由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理想。他们认为自己从一出生就因为农村户口而受到非难，农村户口意味着他们在城市工作时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福利。（Pun, Lu, 2010 年）

为了获得尊严和承认，外地民工争取文化地位的要求特别迫切，就像 19 世纪英国工人阶级在类似的处境下一样。（汤普森，1966 年）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环境完全不同，至少因为在 1978 年经济转型之前的三十年，有一个强大的、处于优越地位的工人阶级，主要在国有部门工作。在改革时代开始以来的三十年期间，以前的工人阶级虽然没有完全瓦解，但已经基本瓦解了。除了工人阶级的残余之外，随着廉价劳动力从农村来到城市从事建设、生产线等工作，一类新的工人开始出现。来自农村的外地民工是否已经形成了阶级意识，从而在讨论时可以将他们当做新的工人阶级，这一点仍值得商榷。（Chan, 萧 2012 年）跟以前完全相同的是，这些新的外来工人显然关心他们的自我描述，强调他们是工人，而不是强调他们是外地人（因为这暗示着来自农村），并在这个过程中力图参与能够提高他们地位的文化活动。（Qiu, 王 2012 年）

在对待不平等的文化以及文化的不平等时所见到的对于语言和自我发展的关注，并不局限于特定的社区。中国中产阶级的概念恰好是在这一背景下传播开的。（郭，2008 年）从统计的角度而言，中国的中产阶级（2012 年）按其消费能力在人口中仍然只占大约 6%，但从中产阶级的志向和所渴望的生活方式而言，其思想扩散的范围在人口当中的比例要大得多。（Silverstein 等，2012 年）住宅建设灵活地面向城市人口的不同部分——年轻的已婚者、有青少年子女的年龄较大的夫妇、退休人士等等，在教育服务、文化活动——以及更重要的是在自我改善等方面，与其说满足目前的需求，不如说是对今后的承诺。（Zhang Li 2010 年）购物中心则比较间接地提供了类似“素质”的暗示以及对不平等的管理的概念。

机会不平等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机会平等的理念是政治和经济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即使在最近这个理念有时变成了由使用者付款的机会平等。上文关于文化不平等的议论表明，机会平等的理念在中国没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表达，更遑论得到广泛理解了。人们占主导地位的印象当然是：存在着制度化的、被人们接受的机会不平等。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平等这个理念本身就受到了中国过去三十年来的经验的挑战。

中国不只是社会不平等，而且有许多变量都是高度两极分化的。获得公共物品的途径和社会流动性的不平等，造成了一系列的拥有者和不拥有者之间的制度化差异：不单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异（Solinger，2012年），而且有中国各地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差异（Cartier，2013年）；那些在改革时代开始时已经在单位工作、生活的人，以及那些受益于经济和社会活动重组的人，跟那些不属于这些情况的人之间的差异（Tomba，汤，2008年）。另外，还有对于财产所有权的明确性别区分。（Sargeson，2010年）

机会不平等在许多方面而言是最重要的不平等。它不仅影响大部分人的生活，而且突出地显示了对政权的威胁，而对于经济不平等或对于基尼系数分析的统计并不会造成这样的威胁。制度化的机会不平等有可能会产生不满和政治行为，因为出现机会不平等的平台是即时的、本地的。下岗的国营企业职工习惯于跟改革和机构调整的受益人密切共处；但当社会的相互作用可能发生必然的变化时，就非常可能出现社会紧张局面。

制度化的机会不平等的出现也非常重要，因为它突出了各级政府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党和国家显然已经造成了它们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但行使国家权力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关键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过程从2005年开始；随后，越来越多的国家预算被专门用于通过面向弱势群体的各种计划，提供更公平的公共物品分配——例如：住房、就业、保健、教育和社会福利。（Duckett和Carillo，2011年）同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只是分配不均或经济不平等。更大的问题是政治和经济文化方面的问题。对于党和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心的考验是相当明显的。与其用贴补丁的办法解决各种具体问题，不如更彻底地解决不平等问题，这就需要建立战略政策和实施计划，以便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于分配和机会等问题的思维方式和相互作用。

古德曼（David SG Goodman）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教育部海外名师，悉尼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学术主任。他的研究关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其最新著作包括《中国的阶级与社会阶层》（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参考文献

薄熙来（2012年）：《薄熙来答记者问实录：重庆这几年新闻真不少》，2012年3月16日

<http://news.ihongpan.com/12/0316/zhy100740.html>

博客（2012年）：博客周刊，《现代快报》，南京，3月19日。

Cartier, Carolyn (2013年)：‘Class, consumption, and th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of consumer space’ in Minglu Chen and David S G Goodman (ed)： *Middle Class China: Identity and Behaviour*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p.34-53.

Chan, Anita and Kaxton Siu (2012 年) :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factors constraining the emergence of class consciousness' in Beatriz Carrillo and David S G Goodman (ed) : *Peasants and Worker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China*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Chen Minglu (2011 年) : *Tiger Girls: Women and Enterpri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ondon, Routledge.

Chen Jia (2012 年) : 《差距调查(待发表)》, 2012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

Davies, James C (1962 年) : 'Towards a Theory of Revolution' in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28, no.1, February.

Dickson, Bruce J (2003 年) :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ckson, Bruce J (2008 年) : *Wealth into Power: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uckett, Jane and Beatriz Carrillo (2011 年) : (ed) *China's Changing Welfare Mix* London, Routledge.

Fang Xuyan and Lea Yu (2012 年) : 《政府拒绝公布基尼系数》, 《财信》, 2012 年 1 月 18 日。

Goodman, David S G (2008 年) : 'Why China has no new middle class: cadres, managers and entrepreneurs' in David S G Goodman(ed): *The New Rich in China: Future Rulers, Present Lives* London, Routledge.

Guo Yingjie (2008 年) : 'Class, Stratum and Group: The politics of description and prescription' in David S G Goodman (ed) *The New Rich in China: Future Rulers, Present Lives* London, Routledge.

Guo Yingjie (2013 年) :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inequality' in Yingjie Guo and Wanning Sun (eds), *Unequal China*, Abingdon: Routledge.

Harvey, David (2007 年) :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4

Huang Yasheng (2008 年) :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ornhauser, William (1962 年) :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Maddison, Angus (2007 年) :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960-2030 AD* Paris: OECD Publishing, Development Centre Studies.

Ortega y Gasset, Jose (1994 年) : *Revolt of the Masses* Norton. [Originally 1932.]

Pickett, Kate and Richard Wilkinson (2011 年) : *The 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 London, Bloomsbury Press.

Lu Hulin (2010 年) : '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 self, anger, and class action amo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present-Day China' in *Modern China*, 36(5).

Qiu, Jack Linchuan and Hongzhe Wang (2012 年) : 'Working-class cultural spaces: comparing the old and the new' in Beatriz Carrillo and David S G Goodman(ed) *Peasants and Worker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China*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Review and Outlook Asia (2011 年) : 'Why China Is Unhappy' in *Review and Outlook Asia* 11 November 2011.

Sargeson, Sally and Song Yu (2010 年) : , 'Land expropriation and the gender politics of citizenship in the urban frontier', *The China Journal*,64, 19–45.

Silverstein, Michael J, Abheek Singhi, Carol Liao, David Michael (2012 年) : *The \$10 Trillion Prize: Captivating the Newly Affluent in China and India*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Solinger, Dorothy (2012 年) : 'The New Urban Underclass and its Consciousness: Is it a class ?'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1(78) 1011-1029.

Thompson, Edward P. (1966 年) :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Tsai, Kellee S (2007 年) : *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omba, Luigi and Beibei Tang (2008 年) : 'The Forest City: homeownership and new wealth in Shenyang', in David S. G. Goodman (ed.), *The New Rich in China*, Abingdon: Routledge, pp. 171–86.

UNRISD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2010 年) : *Combating Poverty and Inequality: Structural Change, Social Policy and Politics* Geneva,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世界银行 (2011 年) :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世界银行 (2012 年) : *Poverty Reduction and Equity*
<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TOPICS/EXTPOVERTY/EXTPA/0,,contentMDK:20238991~menuPK:492138~pagePK:148956~piPK:216618~theSitePK:430367,00.html>

Whyte, Martin King (2010 年): *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Yin, Sim Chi (2012 年): 'Anxiety lingers despite outward calm in Wukan' in *The Straits Times* 9 January 2012.

Zhang, Li (2010 年): *In Search of Paradise: Middle-Class Living in a Chinese Metropoli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赵穗生 (2010 年): 《中国模式探索: 能否取代西方的现代化模式? 》, 《现代中国》杂志 19 卷 (65)。